

自然主义研究

——21 世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尤瓦娜·林肯 Yvonna S·Lincoln 著
伊冈·古巴 Egon G·Guba

杨晓波 译
林 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自然主义研究(Naturalistic Inquiry)

——21 世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原著 尤瓦娜·林肯 (Yvonna S. Lincoln)

伊冈·古巴 (Egon G. Guba)

译者 杨晓波 林 捷

本书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策划、资助出版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主义研究:21 世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美)林肯等编著;杨晓波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8

ISBN 7-5023-4705-4

I. 自… II. ①林…②杨… III. 教育学-研究方法 IV. G40-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087 号

出 版 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中央电视台西侧)/100038

图书编务部电话:(010)68514027,(010)68537104(传真)

图书发行部电话:(010)68514035(传真),(010)68514009

邮 购 部 电 话:(010)68515544-2953,(010)68515544-2172

网 址:<http://www.stdph.com>

E-mail:stdph@istic.ac.cn;stdph@public.sti.ac.cn

策 划 编 辑:王亚琪

责 任 编 辑:王亚琪

责 任 校 对:张 娜

责 任 出 版:王芳妮

发 行 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

版 (印)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960 16 开

字 数:372 千

印 张:21

印 数:1~1500 册

定 价:30.00 元

©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字迹不清、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京)新登字 130 号

内 容 简 介

《自然主义研究》一书是作者在质性研究领域的早期著作,发表于 1984 年,对后来的质性研究起了奠基作用。由于该书的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理论结合实践等特点,一直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们所喜爱,多年来它一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生研究方法课程的基本教材,也是出版商冠以“五星”的推荐书籍,多次印刷,热销至今。

作为美国各大学研究生研究方法课程的基本教材,该书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并掌握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它对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进行了深刻地反省,澄清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统与非传统范式中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关系。该书奠定了自然主义研究的基础,为在自然主义框架内的研究提供了操作性指南,开辟和倡导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教育研究者及社会科学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译者的话

该译作是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的大力倡导和敦促下成文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王保华教授及丁月牙博士为该译作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对该译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也给予了支持。在此向他们致谢。

本书是美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的经典著作。借用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教育管理系研究方法专家吉姆·谢瑞克(Jim Scheurich)教授的原话:“这本书改变了美国教育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认为,该书的最大特点包括三点:首先,该书从方法论历史的角度,介绍了自然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它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第二,该书从比较的角度,把传统研究方法与自然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对比,论证了自然主义研究方法的真实性。第三,该书从实践的角度,介绍了如何使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

该译作是在原著者尤瓦娜·林肯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林肯教授是我们方法论课程的导师(本书实际上也是该课程的教科书),因此我们得到了她耳提面命的亲身教导。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以时时与她直接交流,请教翻译中的疑难和困惑。

该译作是两位译者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结晶。我们并没有采用各人数章的翻译方法,而是自始至终共同翻译全文。书中的每字每句(甚至标点符号)都是我们共同讨论(有时是争论)、字斟句酌的结果,从而使译作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风格一致、融会贯通。

该译作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著的风貌。在语言、格式、风格、注解、引文、参考资料等等方面,我们都尽量保留原汁原味,试图与原著保持一致。在原文中体现出浓郁强烈的美国文化之处,我们都给予了译者的注解,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此外,为了利于读者进一步使用和查找,我们还尽可能地在专用名词、术语、第一次出现的人名、美国俚语等译文之后,附加了英文原文。

在此,我们还要向读者透露一个消息:应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邀请,林肯教授本人将于该译作出版之际(暂定于2004年7月),飞往北京,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办“质的研究方法研讨会”,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届时参加,并亲自向她讨教有关问

题。

该译作的翻译工作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2 月)。在此期间,我们两人都经历了严格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繁重的博士课程和考试之余,我们挤出分分秒秒,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希望作品不会令读者失望。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这个任务带来了不少压力,但是,它也让我们获得了深刻理解自然主义方法的珍贵机会,所以我们乐此不疲。更让我们乐在其中的是,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到经典之作的不可魔力,经常沉迷、感叹于原著的深邃和精彩之处。这就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得以看得更远、想的更宽。

由于时间紧迫、译者水平有限,我们也时有捉襟见肘的感觉,然而,我们真挚地希望,读者在看完此书之后,能够像我们一样,领略到自然主义研究方法的魅力所在。套用一句林肯教授的话,此译作“谨献给那些我们希望触动和影响的继往开来者”。

杨晓波 林捷

2004 年 2 月 23 日,于美国德州 A&M 大学哈里顿教学楼

前言

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某些特定的方式去回答那永恒的话题——什么是可知的?如何得知它们?有时这个答案高深莫测,犹如古老的东方宗教。有时这个答案神秘诡异,著名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莱泽尔爵士(Sir James Frazier)很久以前就指出,原始巫术和现代科技之间密切相关,因为两者都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企图控制宇宙。有时这个答案又绝对权威或者发人深思,有如亚里斯多德的语录或圣经的训谕。

这永恒的话题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得到了最好的回答,那就是通过直接探究自然,从自然本身(Nature itself)中寻找答案。这种实证方法无疑是引发著名的“启蒙时代”的强大动力。现代物理学、医学、太空技术、甚至核武器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可以追述到那个科学思考最初萌生的时代。

但这些古老的话题并未就此盖棺定论。无论是在“硬科学”这类已经得到充分解答的领域,或者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这样的“软科学”领域里,它们都在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当旧的范式无法解释新的事实时,科学大殿之上即显现裂痕。库恩(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论断越来越难以立足,另类范式(alternative paradigms)的观点正挑战着传统的答案。

本书就是挑战之一。它以“自然主义”(naturalistic)的称谓,穿越历史的时空,描述了一种另类范式。这种范式也被称为: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ic)、人种志(ethnographic)、现象研究(phenomenological)、主观主义(subjective)、个案研究(case study)、质的研究(qualitative)、解释学(hermeneutic)、人文主义(humanistic)等等。具有如此多的称号是因为研究者企图表达它的不同含义,正如有时基督徒也可以被称作天主教徒、东正教徒、路德教徒、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基督再临派、正统派、浸信会教徒等等。使用这些不同的称呼,是为了区分各派不同的教义。本书也采用了宗派主义(sectarian)的立场,以特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主义,持有自己的诠释和观点。但是研究本身牵涉广泛,确实也难以简单定义“自然主义”,因此读者在本书中不会看到这样的句子:“自然主义是什么什么”。相反,我们收集了各种观点,希望给予读者一个有关自然主义的大致轮廓。

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把自然主义的观点应用到评价领域。在此期

间,我们中的一个(Guba, 1978)引用了九种自然主义的定义。其中大多来自于艾德文·威勒姆斯(Edwin P. Willems)和哈罗德·罗西(Harold L. Raush)编辑的名为《心理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观点》(Naturalistic Viewpoint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69)论文集。该书明确阐释了各类学者的不同意见。我们至今仍深受威勒姆斯“自然主义”定义的影响:

“在行为主义研究中,自然或自然主义……是调查者实施的一种功能,是调查者在两维的描述性研究空间中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大多数研究行为都涉及的第一维度,描述了调查者影响或操纵研究行为实验条件的程度,前提是这种影响或操纵的程度能够发生从高到低、从多到无的变化。较少被涉及的第二维度,描述了调查者关于研究行为的分类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程度。”(Willems & Raush, 1969, p. 46)

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的是:首先,研究者不能操纵研究环境,其次,研究者不能对结果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自然主义的调查是自然主义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活动,而以上的两条是该类研究活动的首要准则。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要强调这两条准则。这不是出于调查者的喜好,也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原因根植于该类范式的假设之中,这是最难把握的事情。我们久已浸淫在科学准则之中,将这个假设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于几乎无法想像以其他方式进行思考。当其他方式被提出的时候,我们往往闭目塞听,视之为异端。

本书正是阐述了这样的异端。我们不想争论这个观念是源于我们、还是我们的论述超越了前人。然而我们试图以一种生动而合理的方式,向那些一直未被自然主义取悦、甚至持有绝对怀疑态度的读者,呈现我们的观念。而且我们增添了一些实际的资料,以便那些有理论背景的读者能够尝试着加以应用。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并操作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

但是,作为一本介绍性的著作,本书绕开了新范式所必须回答的复杂问题。总体而言,我们并不对这种范式追本逐源。我们也不着意于相关的哲学或认识论的阐述。我们更不寻求这种范式的社会意义。这些都属于其他著作的任务范围。

本书不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完全的作品,而是一系列新兴观念的简要描述。我们前后期作品的比较揭示了我们思想的变化过程,有些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这可能缘于急于发表的心情——也许这次我们又重蹈覆辙了——或者过于笼统的阐述迫使我们不断地改进,以避免陷入更难堪的境地。虽然这样的辩解部分属实,我们还是乐于承认这些变化是新生领域的伴生物。在这些领域中,旧的问题还未

得到解答,新的问题就已层出不穷。

引用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种持续性的变化。我们已经表明,自然主义的研究不是也不能价值中立,但我们还是刚刚明白这句话的充分涵义。如果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所持价值观念的影响,那么任何研究都应该为某种价值观念服务。这种论调当然不是新的,但是它对于那些惯于以传统科研方法思考和研究的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实际上,女权主义和批判理论这两种理论的作者们已经涉及到此类情况。在瑞哈兹、波伯克、怀特(Reinharz, Bombyk, & Wright, 1983)所著的《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Feminist Research)一书的参考书目中,枚举了数百个与自然主义研究相关的书名和论文。

批判理论的文献中,此类观点也比比皆是,其中的分支“批判人种学”(critical ethnography)日趋成熟。我们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探究这两种理论的关系,以便进一步理解在研究中价值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我们中的一员林肯于1984年秋在英国与英格兰和苏格兰批判理论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评论家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当我们在此书中谈及到研究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时,显而易见我们的观点已经大有改进。因此对我们而言,在这一两年内,我们所说的观点有所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本书共分十三章。前七章主要展示了针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论述,我们常称这种传统范式为“实证主义”(positivistic),以区分于我们所倡导的另类范式——自然主义。第一章概述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它所面临的困难,并以较小篇幅论述了它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五个公理(axioms)。第二章讨论了另类范式的合理性,回答了下列问题:在承认实证主义面临困境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种另类范式来替换它?合理性何在?根据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斯瓦兹和奥基伟(Schwartz & Ogilvy)提出的结论——范式革命正在许多领域里展开——我们相信我们所拥护的研究范式革命同样正在进行。针对五个公理,第三章到第七章依次阐述了:(假设中的)现实本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或者说,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泛化的可能性;解释的本质(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价值的角色。从所谓硬科学中引用的大量证据表明了,范式的转变不只发生于人文研究领域,而是遍及于各种研究中。第八章从纯理论角度转向实践角度探讨自然主义研究。执着于某类范式是否意味着研究者一定会采用某种研究方法?换言之,范式是否代表了研究方法?在第八章中,我们认为确实如此,而且进一步强调了我们所主张的是:通过一个相互作用的程序和方法所构成的体系,来体现自然主义公理的主旨。我们并不排斥其他技术和手段(例如,我们绝

不否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范式(如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偏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第九章到十三章是“操作”章节。第九章提出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主义的研究,我们坚持认为设计不能提前于研究过程本身,而必须伴随着研究过程来完成。那么研究者预先能做什么呢,尤其当他们试图吸引研究资金的时候。第十章涉及到应用性问题:在现场(field)中做些什么呢?(自然主义的研究总是发生在现场,即真实自然的环境,而不是人为设定的情境)。第十一章提出了关于真实性的棘手问题:读者凭什么相信研究报告的内容呢?我们讨论了和传统研究方法类似的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以及客观性的问题,并描述了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第十二章讨论了数据收集整理的方法,强调了在自然主义研究中,数据收集过程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促进了设计的制定和实施,并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第十三章涉及到研究完成阶段的三种活动:撰写个案研究报告(个案研究是自然主义者选择的报告模式)、参与者检验法——一种提高可信性的保障真实性技术、审计法——另一种类似于传统检验信度和客观性的保障真实性技术。

我们必须提及以下给予我们极大帮助和协作的人名,其中有著名的学者苏拉米特·瑞哈兹(Shulamit Reinharz),他审阅了整部手稿,并提出了很多敏锐的问题。《教育交流与技术》杂志的编辑罗伯特·黑尼赫(Robert Heinich)激励了我们两篇论文的产生,从而完善了我们的观念。盖瑞·普廷格(Garrel Pottinger)和道格拉斯·莱克(Douglas Lackey)阅读了有关因果关系的章节,从科学哲学家的角度出发帮助我们解决了在成文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彼得·斯瓦兹和詹姆斯·奥基伟的作品使我们认识到自然主义范式有着比我们原来所想像的更宽泛的范围,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汤姆斯·斯格提克(Thomas Skrtic)将我们的观点应用于一个两年研究中,该研究由堪萨斯大学资助,目的是为农村地区残疾青少年提供服务。它让我们看到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功效。丹尼斯·帕路博(Dennis Palumbo)作为堪萨斯大学公共事务中心的主任,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机会进行反思。我们同时还要感谢许多朋友,他们在必要时启发我们,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某些观点,他们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艾内斯特·浩斯(Ernest House)、迈克尔·奎恩·巴顿(Michael Quinn Patton)、罗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ke)。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年轻的思考者,因为试图影响他们而激发的动力促使我们完成此书。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早期自然主义评价研究的专论中,他如此论述道:

“虽然我十分确信该书的观点,但我绝不试图去说服那些经验丰富的自然主义

者,因为长期的研究工作使他们固守着自己的观念。我寄希望于未来年轻的自然主义研究者们,他们会公正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两个方面。”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我们希望触动和影响的继往开来者。

——尤瓦娜·林肯,于堪萨斯州劳伦斯

——伊冈·古巴,于印第安那州布卢明顿

中文版前言

我们非常高兴的得知《自然主义研究》一书的中文版得以出版了,我们希望,教育社会科学领域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和研究者能够从中获益。

我们最初写作此书的哲学和实践的出发点都与现在不同。当时,我们仍试图符合实验研究和统计(以及其他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公理和范式的要求,然而,我们逐渐认识到:某些形式的知识就是无法通过实验和准实验设计加以表达和运用。通过实验和统计方法获取的答案,不仅不能改变教育和评估实践,或者取得社会或教育的积极变化,反而让许多读者不知所云。我们常常发现,尽管我们为项目参与人员提供了诸多的事实和图表,他们的行为却与我们精确的信度估计背道而驰,或者违背了我们有关内外部效度的假设。我们觉察到,确实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研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决定去发掘它究竟是什么。我们终于发现,项目参与者根本不关心数据证据,他们对复杂的因素分析毫无兴趣,而是完全听从于他们从教育变革、社会项目、实验中自己获得的“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发现,个体和团体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知识,而不是根据局外人的精确统计来获取意义。我们还发现,实际上,在任何的社会或项目情境中,个体和团体行为的基础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在的、理解和构成意义的过程,而不是我们所宣称的严格统计。他们总是选择自己的、社会构建的、情境决定的现实,而不是我们对他们的现实所进行的人为的、外部强加的数学解释。

《自然主义研究》一书就是我们试图创造一个另类范式模型的结果,用于解释我们在社会科学和教育情境中所观察到的现象。这非常类似于几何学家试图创造一个不同于欧式几何学的另类体系,例如罗式几何和黎曼几何。在同行的启发和帮助下,我们的思想得到了磨砺,并找到了另外的公理体系,理解了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其中包括与之相应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目的论以及方法论。

我们从未也不会就此批评实证主义,相反,我们设法指出实证主义和实验方法在认识事物上的局限性,同时,我们不赞同实验主义者的如下宣称:实验方法是获取科学的、严格的、规范的或系统的研究的唯一方法。自该书发表以来,我们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宣称,定量方法在规范科学研究中就一无是处。相反,我们相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会更好、更

充分的为研究者服务。因此,我们强烈主张研究训练应当囊括定量方法、质的方法和其他方法。

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了其他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存在着多元的认识论;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仅仅是其中的两个。批判理论的各种形式,从批判主义到女权主义到人种学等,在解释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基石方面都贡献巨大。本土认识论虽然建立在非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认识方式富含社会 and 情境的意义。熟知了这几个理论框架后,从中获得的视角和认识论就有助于取得更加敏感、更相关的研究结果,而且能够使得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达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第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举个例子,亮出博士学位的头衔可能会阻碍对当地情境的理解。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被研究者应该完全参与到研究过程中来,由被研究者提出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不仅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还能满足研究者的学术需求。第三,研究者开始怀疑:仅仅抱有中立的探究心态,是否足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有限的资源、社会 and 全球问题的压力,越来越表明,研究必须也应该旨在满足解决教育和社会问题的需求。换句话说,在数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等硬科学领域中驱动研究的那种好奇心,与在教育实践和社会科学中探究深刻问题的动机截然不同。

在这些理解之上,自然主义研究可能已经不仅仅是研究可选择的另类范式;对于研究社会中人们的理解和构成意义的过程,它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我们衷心的希望本书能够为研究者的研究工具库增添新的装备,从而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有用的、丰富的、敏感的、参与的行为基础。

——尤瓦娜·林肯

——伊冈·古巴

2004 年 6 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前言

中文版前言

第一章 后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范式	(1)
第二章 自然主义范式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	(28)
第三章 构建的现实	(46)
第四章 干扰和被干扰的观察者	(64)
第五章 唯一的泛化就是没有泛化	(77)
第六章 因果关系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吗?	(91)
第七章 价值中立有价值吗?	(115)
第八章 在自然状态中进行研究	(134)
第九章 设计一个自然主义的研究	(160)
第十章 实施一个自然主义的研究	(181)
第十一章 建立真实性	(208)
第十二章 自然主义研究的数据处理	(239)
第十三章 个案报告法、参与者检验法、审计法	(257)
参考文献	(274)
附录 A 审计记录类别、文件类型和证据	(295)
附录 B 自然主义研究的审计程序	(298)
附录 C 中英文人名对照	(308)

第一章

后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范式

我思,故我行(Schwartz & Ogilvy,1979)

范式和范式时代

人类历史上,有着形形色色探究世界的方式。我们的好奇心也指向同样的基本问题。我们在研究领域的不断进步,是建立在前人探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的。什么是世界?怎样去探知世界?怎样以我们的目标来管理世界?究竟什么是真理?

真理这个概念是难以捉摸的。朱丽娜·福特(Julienne Ford)在她诙谐奇趣的著作《范式和童话》(Paradigms and Fairy Tales, 1975)中,申明真理这个术语含有四种不同的寓意,她将之命名为:真理一(T1)、真理二(T2)、真理三(T3)、真理四(T4)。真理四即科学家熟知的经验真理(empirical truth);当假设的前提和事物的本质相一致时,我们称这种主张为真理四。(或者,用福特的话说,“呈现原样”[perserves the appearances]¹)。真理三是逻辑真理(logic Truth);当某种主张在逻辑上和数理上与其他已被证明的主张一致或者它与被称为“真理一”的基本理念完全一致时,我们称之为真理三。真理二是道德真理(ethical truth);当该主张持有者的行为与道德和职业标准相一致时²,我们称之为真理二。

真理一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它可被称为形而上学的或超自然的真理(meta-physical truth)。不像真理二、真理三、真理四,真理一是无法被检验的,因为其真实性与外在规范(比如:本质一致性、逻辑推理性、专业行为标准化)相抵触。形而上学的观念必须在表面价值(face value)上被接受,正如亚里斯多德所知(Reese, 1980, p.70)和福特所强调的,基本的理念(T1)永远无法被证实是个事实(T4,与

本质相一致)或者是虚假的。这些基本理念代表了最终级的、用来检验一切事物的标准。因为如果还有其他更基本的标准,那么这种更基本的标准就可以被看作是属于真理一的基本理念。

现在,某套基本的或超自然的理念组成了一个观念体系,这个体系“或者给我们判断现实本质的能力或者给我们满足于已知世界、并继续探究未知世界的理由”(Reese, 1980, p.352)。我们应该称这种观念体系及其方法为范式(paradigm)。³

范式代表了我们的认知世界的精髓(但不能证明)。我们在世界的行为,包括我们作为探究者的行为,必须以范式为指导。“我思,故我行”。但是,范式也有其局限性:

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观念、一种分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法。因此,范式深藏于其追随者和实践者的社会化过程中:范式告诉他们什么是重要的、合法的、合理的。范式也具有标准化的特性,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正是范式的这些方面构成了其优劣的特性,其优势体现在它有助于行动,其劣势体现在:行为的根本原因深藏于未被质疑的范式假设中。(Patton, 1978, p.203.)

笔者的立场是:无论自然科学的研究或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已经经历了数个“范式时代”。每个时代的基本理念以不同的方式指导着研究。我们可以简要的将这些时代划分为: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基本理念、或超自然的原则用以指导其追随者的行为。我们应该看到:即便被现有学科中的先锋思想家所质疑,直到今天,实证主义立场仍旧指导着实践者的研究,特别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此外,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由于这些方法是建立在一种超自然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与前卫的学科发展原则产生了不和谐音,因此,势在必然的,实证主义要向后实证主义立场转移。因为,如果观念和思想的新范式出现了,与之平行的、新的研究范式也应被构建。

谏 言

谈及范式变革的那些时代,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着一种范式,在其形成过程中的无数次尝试,最终都是向这种范式靠拢。如果科学能够成功的和这种范式聚合,那么就能很快找到答案,并在经验世界中予以检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解惑。想要获知这个不断靠拢的过程,就必须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正如白利·巴纳斯(Barry Barnes)所说:“科学史学家的课题是研究现代科学的历史演进过程”(引自 Hesse,

1980, p.47)。但是,玛丽·哈赛(Mary Hesse, 1980, p.4-5)指出:

大致说来,现在是检验过去的真理和合理性的标准,它为归纳主义历史学家提供了基础,使之按照可接受的归纳结构,来重新构建过去的论断,来重新审视过去所谓荒谬虚伪的理论。当然这些归纳性历史有很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其自相矛盾性——如果所有理论都具有危险性,且易被取代,那么以归纳法来审视过去的这种理论也是如此。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谏言。第一,既然迄今为止,所有理论和其他科学历史上重要的观点都显示了虚假和不可接受的特点,那么目前所有理论仍旧具有这个缺点。这种认识使我们耻于承认“终极真理”(真理一)的存在。因此,这本书不是企图去解释终极真理,而是去探究终极真理,并在这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上,烙下自己的足印。我们并非创造一个新的经典理论,而是想要触动旧观念保守者的神经。

第二,无论是科学或其他理论,对于变化都具有极强的免疫力。因此范式变革这样的极端时期不可能是和风细雨的。借用现代组织理论的术语来说,理论是“松散结合的”(“loosely coupled” Weick, 1976)。如同哈赛所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多对一”的关系。同一事实可以被多种理论解释:

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系统或多或少适用于同一事实,究竟采用哪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标准而不是事实来判断。标准的判断涉及到简洁性、与科学其他部分的一致性,等等。著名的学者奎恩(Quine)早已对此盖棺定论,他认为在任何论据面前,任何论断都可以是真实的。“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彻底地操纵证据,任何论断都可以成真”。(Hesse, 1980, p.86)

因此理论的松散结合的本质使得科学家在放弃某一理论(或范式)前,有足够的空间去操纵论据。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调整理论体系加以调和。

无独有偶,威姆萨特(Wimsatt, 1981, p.134)定义了各种流行理论的“生命力”(robustness)。他宣称,这种生命力派生于理论的松散结合、彼此隔绝的构造。

科学理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其不协调性被彼此隔绝,不会在大范围内出现来影响理论本身……当不协调发生时,依赖于一个或多个相互矛盾的假设所得到的结论是柔弱的。这种柔弱性具有传染性,可以感染到依赖于这种结论的事物以及与其有逻辑关系的派生物上,就像多米洛骨牌的坍塌一样——直至遇到独立于这种结论之外的事物才停止。这种独立物抵制了坍塌的延续。如果导致不协调的演绎或推论遇到了一个有生命力的结果,那么坍塌就限制在这个结果之内,不协调就与体系中其他部分相隔绝。因为这些有生命力的结果,就算其中某一个支持模式遭